

歌謠形式下的訓誡與啟蒙： 論張之洞《學堂歌》

李 鵬

[提 要] 張之洞《學堂歌》在思想內容上與其《勸學篇》有很多相通之處,既有從正人心出發的訓誡,也有從開風氣出發的啟蒙,從中可見過渡時代新、舊知識與觀念之間的角力。在文本形式上,張之洞從中國古老的歌謠傳統中選擇了更利於表達、更便於傳唱的“三三七”句型。《學堂歌》最初分發湖北省城內外各學堂,此後越出湖北省界,成為唱歌科課本。藉助淺近活潑的歌謠表達形式以及教育體制的有力推動,《學堂歌》將《勸學篇》裡的核心思想“中體西用”傳播得更深更廣,擴大了它在近代中國的影響力。而其“三三七”句型,是對先秦以來中國民間歌謠傳統表達形式的繼承與發揚。因此,《學堂歌》是一兼具思想文化史、文學史意義的特殊文本。

[關鍵詞] 張之洞 學堂歌 勸學篇 “三三七”句型 中體西用

[中圖分類號] I207.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4) 03 - 0146 - 10

在張之洞諸多著述中,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完成的《勸學篇》因其系統地闡述了“中體西用”思想而受到普遍重視,^①甚至被一些學者視為張氏生平最重要的著作。^②相較之下,《學堂歌》並不起眼,雖然近代音樂史領域研究學堂樂歌的著述偶爾會提及,但因為它僅有歌詞而沒有樂譜,所以多是一帶而過。^③實際上,除了在近代音樂教育方面的探索之功,就其思想內容而言,《學堂歌》與《勸學篇》之間有很多相通之處,只不過因預設的接受者不同,兩個文本採取了迥然不同的表現形式而已。而且,在《勸學篇》以上諭形式頒行天下之後,《學堂歌》的撰寫與推行,以更為通俗的形式將“中體西用”思想傳播得更為深廣,這在思想文化史上的意義絕非一般歌詞可比。另就其文本形式來看,《學堂歌》與先秦以來的中國歌謠傳統之間有著深厚的淵源關係,從中能夠看到漢語歌謠因其語言特質形成的表達方式具有何等長久的生命力。因此,張之洞的《學堂歌》值得我們作更為細緻的審視。

一、《學堂歌》的內容

光緒三十年十二月初六日(1905年1月11日),張之洞下發《札學務處發學歌、軍歌》,要求學務處“將發去《學堂歌》五千分並附發《軍歌》一百分查收,先行分發省城各學堂,散給各學生,令其

熟讀歌唱，以資感發。務須人給一紙，不可遺漏”。^④該公牘後附有《學堂歌》和《軍歌》。

《學堂歌》共分十三段。第一段概說興辦學堂總綱，頭兩句為：“天地泰，日月光，聽我唱歌讚學堂。聖天子，圖自強，除去興學無別方。”^⑤開宗明義，強調如欲自強，興學堂是唯一辦法。接下來五句分別說學堂裡“教體育”、“教德育”、“教智育”。前此光緒二十九年（1903），張之洞與張百熙、榮慶擬定《學務綱要》，在“全國學堂總要”中強調“從幼童入初等學堂始”，教師講授功課時就應“曉之以尊親之意，納之於規矩之中”，也特別提到“外國學堂於智育、體育外，尤重德育，中外固無二理也”。^⑥此次重定學堂章程，通曉學務的張之洞是實際主持人，因此《學務綱要》裡關於德、智、體育的表述，實際源於他前一年所上《籌定學堂規模次第興辦摺》中的“考日本教育，總義以德育、智育、體育為三大端，洵可謂體用兼賅，先後有序”，^⑦都是把德育放在第一位。稍有不同的是，《學堂歌》把體育放在最前面，說“教體育，第一樁，衛生先使民強壯”。^⑧

第二段主要概說中國所處地理位置、寒熱帶以及五大洲等。第三段則接著講述中國輿地山川，還涉及人種、沿海口岸以及內河港口。第四段概述中國從三皇五帝到清朝同光中興的歷史。第五段先縷述各學科門類，然後簡要介紹學堂體系以及學習中外各種語言的用途。這裡介紹的學堂體系實即光緒二十九年張之洞與張百熙等人會商之後推行全國的“癸卯學制”：普通教育從小學、中學到高等教育，此外還有與此並行的師範教育和實業教育，而高等教育裡的大學堂又分八科，所謂“大學內，分八項，專門經濟佐廟堂”，^⑨還有與大學堂相當的“專備交涉使四方”^⑩的方言學堂，通儒院則位居該學制金字塔的頂端。

第六、七、八段專說湖北的歷史與當下，其中第六段為“說鄉賢”，第七段為“說名宦”，第八段講湖北省在《辛丑條約》簽訂後將攤派到本省的“賠款捐”中由各州縣承擔的那部分留作興辦學堂之用，^⑪即“派賠款，搜索忙，各省分派民與商。湖北省，免捐項，就將此款興學堂”，湖北教育發展因此遠超全國其他省份：“湖北省，二百堂，武漢學生五千強”，“湖北省，採衆長，四百餘人東西洋”。^⑫

第四、六、七、八段關於中國歷史和湖北歷史的概述，其指導思想是光緒二十九年張之洞實際主持制定的《奏定初等小學堂章程》中關於初等小學歷史科目的規定。該章程認為，歷史科目的要義在於“略舉古來聖主賢君重大美善之事，俾知中國文化所由來及本朝列聖德政，以養國民忠愛之本源。尤當先講鄉土歷史，採本境內鄉賢、名宦、流寓諸名人之事迹，令人敬仰嘆慕、增長志氣者為之解說，以動其希賢慕善之心”。^⑬《學堂歌》裡對“我大清”德澤功業的讚美，以及所謂“說鄉賢，知趨向”、“說名宦，知宗仰”，^⑭即源於這一思路。

第九、十兩段用中外正反事例證明只有興學培育人才方能興邦雪耻，否則將遭強國兼併而滅亡。這兩段實即張之洞《〈勸學篇〉序》中“一知耻，耻不如日本，耻不如土耳其，耻不如暹羅，耻不如古巴；二知懼，懼為印度，懼為越南、緬甸、朝鮮，懼為埃及，懼為波蘭”的另一表述。^⑮第十一、十二兩段則左右開弓，對“守舊黨”、“維新黨”、革命黨、“會匪黨”一一予以抨擊。

第十三段是收尾，勉勵同學們奮發向上，學成文武藝，做國之棟梁，如此則“中國盛，聖教光，黃種尊貴日蕃昌。上孝慈，下忠良，萬年有道戴吾皇”。^⑯其實，這裡回應的仍是《勸學篇》裡“保國、保教、保種”的焦慮。面對前所未有的世變，欲扶大厦於將傾的張之洞在《勸學篇》內篇《同心第一》裡開出的救時之方是“學術造人才，人才維國勢”，^⑰即只有興辦學堂，培育人才，國家才能從困局中走出來。而他之所以如此熱心地撰寫《學堂歌》，其根本目的也在於此。

二、《學堂歌》的文本形式

雖然《學堂歌》在張之洞著述中形式較為特殊，但晚清重臣中，張之洞並非第一個撰寫歌謠的。

在他之前，曾國藩在咸豐二年（1852）居鄉時曾作過《保守平安歌三首》，咸豐五年、六年、八年在軍中又先後作《水師得勝歌並序》、《陸軍得勝歌》、《愛民歌》等。曾國藩這些歌謠，全用七字句，基本上兩句一押韻，語言極通俗，例如《保守平安歌三首》中的《第一莫逃走》云：“我走天下一大半，惟有此處可避亂。走盡九州並四海，惟有此處最自在。別處紛紛多擾動，此處却是桃源洞。若嫌此地不安靜，別處更難逃性命。只怕你們太膽小，一聞謠言便慌了。”¹⁸

與曾國藩的歌謠不同，《學堂歌》沒有通篇採用七字句，而是採用了“三三七”句型，即用兩個較為短促的三字句和一個七字句搭配成一長句，第二個三字句及七字句均押江陽韻，一韻到底，鏗鏘有力。這一表達形式有三個優點：其一，兩個三字句與一個七字句搭配，可以有效避免通篇七字帶來的單調感，增強了節奏感。其二，選用三、七字奇數句而不是四、六字偶數句，更便於單音節詞與雙音節詞之間的靈活搭配，表達更流暢。其三，通過韻腳的呼應，不僅將前兩個三字句與後一個七字句連成一個整體，同時也保證了整首歌謠形式上的整齊及音調上的和諧。在《學堂歌》最後一段，張之洞點明這一形式源自《荀子·成相》篇：“荀卿子，歌成相，此歌勸學略摹仿。”¹⁹“成相”，按照盧文弨、俞樾的解釋，就是“奏此曲”、“成此曲”的意思，盧文弨甚至認為“審此篇音節，即後世彈詞之祖”。²⁰《成相》篇共分 56 節，各節相對獨立，每節 5 句，各句字數依次大體是三、三、七、四、七，除第四句外，句句押韻。顯然，《學堂歌》在形式上確實模仿了《成相》篇。

一般認為，《荀子·成相》篇在形式上與當時民間文藝有極大關係。²¹實際上，“三三七”句型在先秦之後的民間歌謠中也有。例如，漢樂府《淮南王》篇首為“淮南王，自言尊，百尺高樓與天連”，南朝民歌《始興王歌》有“赴人急，如水火，何時復來哺乳我”，北朝民歌《敕勒歌》有“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地見牛羊”等。²²唐代敦煌變文《金剛般若波羅密經講經文》裡唱經詞有大量“三三七”句型，如“世間事，目前存，苦樂相兼有甚誇”、“也剛築，也柔和，虛空逼塞滿娑婆”等。²³此外，像杜甫《兵車行》開篇即是“車麟麟，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²⁴而白居易新樂府詩中這種句型則更多，如《七德舞》首句為“七德舞，七德歌，傳自武德至元和”，²⁵《母別子》首句為“母別子，子別母，白日無光哭聲苦”²⁶等。據我統計，白居易 50 首新樂府中，嚴格以“三三七”句型開篇的有 20 首，佔了 40%。如果再加上另外 11 首以“三七”句型開篇的，則高達 62%。陳寅恪先生認為白居易此類創作表達形式與民間歌謠流行體制的影響有關：

關於新樂府之句律，李公垂之原作不可見，未知如何。恐與微之之作無所差異，即以七字之句為其常則也。至樂天之作，則多以重疊兩三字句，後接以七字句，或三字句後接以七字句。此實深可注意。考三三七之體，雖古樂府中已不乏其例，即如杜工部《兵車行》，亦復如是。但樂天新樂府多用此體，必別有其故。蓋樂天之作，雖於微之原作有所改進，然於此似不致特異其體也。寅恪初時頗疑其與當時民間流行歌謠之體制有關，然苦無確據，不敢妄說。後見敦煌發見之變文俗曲殊多三三七句之體，始得其解……然則樂天之作新樂府，乃用毛詩，樂府古詩，及杜少陵詩之體制，改進當時民間流行之歌謠。²⁷

陳寅恪先生敏銳的學術洞察力令人敬佩，但他僅將“三三七”句型溯至樂府古詩，並沒有提及《成相》篇。

及至明清時期，民間盛行彈詞。例如，明代楊慎編撰《廿一史彈詞》，所謂“今將歷代史書，大略編成一段，攢十字詩詞”，他採用“三三四”句型說唱歷史，比如卷一“總說”云：“盤古生，一出世，初分天地。至三皇，傳五帝，漸剖乾坤……”²⁸這部彈詞雖然後一句採用四字句，但前兩句也是三字句。兩相比較，“三三七”句型將後一句增至七字，擴大了表達容量。清代彈詞則多用七字句，鄙夷

者徑稱其為“七字句的盲詞”，²⁹如《玉鴛鴦》通篇為七字句，³⁰而陳端生《再生緣》則基本上是七字句，偶爾雜以三字句，因此陳寅恪先生《論〈再生緣〉》也是直接將彈詞稱為“七字唱之體”，並斷言“《再生緣》之文，質言之，乃一叙事言情七言排律之長篇巨制也”，“彈詞之文體，即是七言排律，而間以三言之長篇巨制”。³¹丘心如《筆生花》為糾《再生緣》立意之偏而作，其體制也是七字句加三字句，有時則連用兩個三字句成“三三七”句型，如卷一第一回寫道：

新刻《再生緣》一部，當時好者競爭傳。文情婉約原非俗，翰藻風流是可觀。評遍彈詞推冠首，只嫌立意負微愆。劉燕玉，終身私訂三從失。怎加封，節孝夫人褒美焉……因翻其意更新調，竊笑無知姑妄言。陋識敢當蓮出土，鄙人原是管窺天。偷弄筆，試披箋，舊套何妨另樣鐫。³²

清代另一種說唱文學子弟書，被啟功師認為是可以與唐詩、宋詞、元曲、明傳奇相媲美的“時代的一‘絕’”，也是“基本上以七言詩句為基調。每句中常常襯墊一些字數不等的短句”。³³子弟書中用來襯墊的短句，不少是三字句，遂成“三七”句型。例如，羅松窗《尋夢》子弟書中有：“悔當初，不該午夢留春睡。勾惹起，無限相思這一場。到而今，寂寂閑庭人冷落，昏昏情緒病淒涼。”³⁴再如，《憶真妃》中也有：“楊貴妃，梨花樹下香魂散。陳元禮，帶領著軍卒才保駕行。嘆君王，萬種淒涼，千般寂寞。一心似醉，兩淚如傾。愁漠漠，殘月曉星初領略。路迢迢，涉水登山那慣經……”³⁵

此外，清代另一種民間說唱文學大鼓書也基本採用七字句。例如，《新出大鼓書單刀赴會》通篇為七字句，開篇寫道：“魯肅設宴江邊上，東吳名將數十員。舉目留神抬頭看，上水下來一隻船。旗杆上邊飄帥字，關公端坐甚威嚴……”³⁶其他像《呼延慶打擂》、《羅成算卦》等大鼓書詞也主要是七字句。

可見，就中國歌謠傳統而言，不長不短、奇偶搭配的七字句是主流。到了清代，民間說唱文藝如彈詞、子弟書、大鼓書多用七字句，有不少甚至通篇皆用七言。曾國藩的軍歌之所以通篇用七言，應該與當時這些民間說唱文藝的影響有很大關係。不過，相較而言，以七言為基礎形成的“三三七”句型或“三七”句型利用增加的三字句裡單、雙音節之間的靈活搭配，既擴充了表達容量，又通過長短相間以及必要的停頓，打破了全是七言句的板滯，節奏感更好，更便於演唱。因此，無論是先秦的《荀子·成相》篇，還是漢樂府、南北朝民歌、唐代的變文、新樂府以及清代的彈詞、子弟書，都青睞這一形式。也就是說，在歌詞形式的選擇上，張之洞可能比曾國藩更為精心，他從中國古老的歌謠傳統中選擇了更利於表達、更便於傳唱的形式。

此外，張之洞《學堂歌》雖然淺易曉暢，却避免了類似曾國藩歌謠中過分口語化的語詞及散文化的句式。梁啟超曾在其《詩話》第120則感慨歌詞創作之難：“今欲為新歌，適教科用，大非易易。蓋文太雅則不適，太俗則無味。斟酌兩者之間，使合兒童諷誦之程度，而又不失祖國文學之精粹，真非易也。”³⁷《學堂歌》的遣詞，經過了“太雅”與“太俗”之間的小心斟酌，絕非率爾下筆，隨意成章。

三、《學堂歌》與《勸學篇》

從寫作時間上來看，《學堂歌》與光緒二十九年十一月張之洞等人奏定的《學務綱要》及學堂章程僅相差一年有餘，因此《學堂歌》裡出現與後者高度相關的表述並不奇怪。不過，張之洞的思想早在光緒二十四年的《勸學篇》裡就已經成熟，由於他是重訂學堂章程的實際主持者，相關思考自然會滲透到章程與綱要中，例如關於學制的安排，《勸學篇》外篇《學制第四》有專門的探討，在考察國外學制的基礎上，將學堂分為小學堂、中學堂、大學堂等。因此，追溯起來，《學堂歌》的根源仍在

《勸學篇》。

首先,《學堂歌》裡很多表述都能在《勸學篇》中看到類似或相關的論述。

例如,《學堂歌》第三段有“黃種古,白種強,黑蠢棕微紅種亡。我黃種,偏東方,滿蒙漢人都一樣”,^③這一關於人種的劃分,源自張之洞對西方人種學的瞭解,其《勸學篇》內篇《知類第四》云:“西人分五大洲之民為五種:以歐羅巴洲人為白種,亞細亞洲人為黃種,西南兩印度人為棕色種,阿非利加洲人為黑種,美洲土人為紅種。”^④《學堂歌》所謂“黑蠢”的說法,表明張之洞也受到西方人種學裡的種族偏見的影響,但以棕色人種的衰微、紅色人種的滅亡與白色人種的強大對舉,是為了突出“保華種”的迫切性,同時試圖以黃色人種悠久古老的歷史激發“我黃種”的自信。

再如,《學堂歌》第五段說到語言學習:“學國文,文理暢,方解經史古文章。學英文,用處廣,英國商務遍華洋。學日文,近我邦,轉譯西書供採訪。學法文,各國尚,條約公牘須磋商。學德文,武備詳,專門字義皆確當。學俄文,交界長,教習雖難也須講。臘丁文,古義藏,隨意學習不勉強。”^⑤《勸學篇》外篇《廣譯第五》也有類似表述:“大率商賈市井,英文之用多;公牘、條約,法文之用多;至各種西學書之要者,日本皆已譯之,我取徑於東洋,力省效速,則東文之用多。”^⑥兩相比較,《學堂歌》多出了德文、俄文和拉丁文,所述更為周備。

又如,《學堂歌》第九段枚舉外國因興學而強大的事例:“俄國強,彼得皇,親到荷蘭學船廠。德國強,由畢相,人人當兵復故疆。勝強敵,合聯邦,皆因小學人才昌。日本強,由尊王,志士伊藤與西鄉。三海島,雄東方,一國三萬小學堂。”^⑦《勸學篇》外篇《游學第二》同樣列舉了日本伊藤等人、俄國彼得大帝以及暹羅世子游學歐洲的事例來證明出洋留學的效果。值得一提的是,《學堂歌》兩次直接提到日本,除了這裡,第二段末尾還有“中國圓,日本長,同在東亞地球上”。^⑧這是由於中日甲午海戰之後,慘敗的中國終於正視日本的崛起,為了救亡圖存,甚至願意屈身向日本學習。例如,光緒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1897年12月4日),汪康年在《時務報》上發表《論華民宜速籌自相保護之法》,認為派人赴日留學不僅省錢而且“所學亦不遜於歐美”。^⑨而康有為戊戌變法時所上《奏請廣譯日本書大派游學摺》則認為應該大譯日本書籍,“若派游學乎,則宜在歐美矣”。^⑩《勸學篇》外篇《游學第二》持論與汪康年相同:“至游學之國,西洋不如東洋:一路近省費,可多遣;一去華近,易考察;一東文近於中文,易通曉;一西書甚繁,凡西學不切要者,東人已刪節而酌改之。中、東情勢風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無過於此。”^⑪張、汪與康雖然意見略有出入,但他們藉由東洋學西洋的想法是一致的。

其次,除了上述顯在的話語雷同,《學堂歌》與《勸學篇》最內在的相似其實是體用二分的思維模式,這充分表明張之洞在思想成熟之後“吾道一以貫之”。

張之洞《勸學篇》主張保留中學裡最為核心的道德綱常,同時採用西學裡富國強兵的科學技術以及一些制度設計,前者是內在根本,不可動搖,後者是外在變通。此即張之洞《〈勸學篇〉序》中自揭寫作宗旨所云:“《內篇》務本以正人心,《外篇》務通以開風氣。”^⑫也即外篇《會通第十三》所強調的:“中學為內學,西學為外學;中學治身心,西學應世事。”^⑬因此,張之洞在外篇《設學第三》談到開設學堂需要注意的五點,第一點即“新舊兼學”,並解釋道:“學《四書》《五經》、中國史事、政書、地圖為舊學;西政、西藝、西史為新學。舊學為體,新學為用,不使偏廢。”^⑭舊學裡除了儒家經典,被認為與經世致用緊密相連的史學、輿地學也受到重視。而在第二點“政藝兼學”裡,張之洞進一步解釋新學裡的西政指“學校、地理、度支、賦稅、武備、律例、勸工、通商”,都是一些社會運行與管理的制度設計,並不涉及政體本身,西藝則為“算、繪、礦、醫、聲、光、化、電”,^⑮都是一些實用科技。

與《勸學篇》一樣,《學堂歌》的內容也可以分為兩部分:一是從正人心出發的訓誡,二是從開風氣出發的啟蒙。當然,有時啟蒙與訓誡也交織在一起。

《學堂歌》裡的訓誡從正反兩方面展開。有正面的教導,例如第一段有“教德育,先蒙養,人人愛國民善良。孝父母,尊君上,更須公德聯四方”,^⑤第四段對歷史上三皇五帝、孔聖人以及“我大清”的頌揚,以及第五段分述學堂各學科時首先說“讀《五經》,誦勿忘,先講大義後精詳。修身學,重倫常,孝弟愛衆尊師長”,^⑥都言之諄諄地對學子進行誘導。

不過,正面的說教容易流於空泛,倒是反面的勸誡能够更清晰地劃定思想與行為的邊界。由於《學堂歌》針對的是年輕的學子,他們思想尚不穩定,因此歌裡禁止性的勸誡話語更多。例如第四段在講完同光中興“平內寇,和萬邦”的功德之後,叮囑學子不要被太平天國的“亂黨”所蠱惑:“切不可,信亂黨,亂黨推戴太平王。毒天下,是洪楊,殺害同種如草莽。”^⑦在第十一段裡,則針對“守舊黨”提出五戒:“拋烟槍”、“纏足放”、“風水妄”、“惹禍殃”、“鄙外洋”。其中“風水妄”指因為迷信而“不敢開山與通江”,以致各種礦產“任它拋棄在山岡”。而“惹禍殃”則指因為反基督教掀起各種風波,比如“青島澳,屬外邦,旅順廣灣教照樣。拳匪亂,驚廟堂,賠九百兆本利長”。對此,張之洞《勸學篇》外篇《非攻教第十五》有更詳細的闡述:“中外大通以來,西教堂佈滿中國,傳教既為條約所准行,而焚毀教堂又為明旨所申禁。比因山東盜殺教士一案,德國藉口遂踞膠州,各國乘機要求,而中國事變日亟。有志之士但當砥礪學問,激發忠義,明我中國尊親之大義,講我中國富強之要術,國勢日強,儒效日章,則彼教不過如佛寺、道觀,聽其自然可也,何能為害?”^⑧而關於鴉片毒害及解決辦法,《勸學篇》內篇《去毒第九》也有專門論述。

如果說對於“無應敵制變之術”以致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守舊黨”張之洞還只是怒其不爭的話,那麼對於無視名教、各種說法與做法危及政權根本的維新黨、革命黨、會匪黨之類他則是深惡痛絕、勢不兩立。《學堂歌》第十二段直截了當地告誡後生:“自由字,莫誤講”、“民權字,莫狂妄”、“革命話,莫鳴張”、“女平權,莫改常”、“叛逆報,莫受誑”。^⑨他認為對新學裡方興未艾的各種話語以及鼓動宣傳這類話語的報紙都必須堅決抵制。他還強調:“我倫理,莫逾蕩,外國愛親尊君王。我聖教,莫拋荒,文明國粹保久長。看日本,改西裝,孔教漢學最尊仰。”^⑩其實,《勸學篇》內篇《明綱第三》即已旗幟鮮明地說:“聖人所以為聖人,中國所以為中國,實在於此。故知君臣之綱,則民權之說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綱,則父子同罪、免喪、廢祀之說不可行也;知夫婦之綱,則男女平權之說不可行也。”^⑪而內篇《正權第六》更是斷言:“民權之說無一益而有百害。”^⑫可見,類似話語一直以來都讓他憂心忡忡。

與訓誡並重的是,《學堂歌》裡還有不少西學知識與觀念的啟蒙。晚清掀起了中國歷史上第二次西學東漸浪潮,身處其中的張之洞迫於時勢,從以不談洋務為高的士林清流轉而成為力倡新學的標誌性人物,在撰寫《學堂歌》時,他當然要將他已經接受並且認為有必要擴大傳播以啟民智的一些基本知識與觀念納入其中,以便衆多年輕學子在傳唱中受到啟蒙。從這個意義上說,《學堂歌》可能是考察西學東漸浪潮在晚清實際傳播效果的上佳文本。

例如,第二段全是從西學來的地理知識:“最尊貴,是太陽,行星地球繞其旁。地球圓,微帶長,萬國人物生四方。熱帶暑,寒帶涼,南北極下皆冰洋。溫帶下,中華當,赤道二十三度強……”^⑬雖然在今天看來,這不過是再基本不過的常識,但對於清末普通學子而言,這却是很有必要的知識普及,而且知識背後還包含著觀念的啟蒙與轉變,如從“天圓地方”到“地球圓”,從“天下”到“世界”“萬國”。

再如,第五段關於新學各學科提綱挈領的介紹:“算數學,簡為上,比例代數捷非常。八綫表,不用想,能通幾何包《九章》。博物學,窮天壤,衛生益智心開朗。理化學,原質詳,配合製造通陰陽。辨炭酸,分硫養,火藥全仗硝磺鎗。電鑛汽,力聲光,理化門門有專長。圖畫學,摹物狀,先用毛筆後尺量。政法學,治國方,後生淺學莫躁妄。陸軍學,分兩堂,戰術計畫戒鹵莽。溝壘速,地形相,火器測準馬善養。體操學,關衰旺,人人勝兵其國昌。”^⑥這對於初學者來說,也是很好的導引。如前所述,這段後面緊接的關於學制的介紹,也是來自對西方教育制度的考察與研究。而對於外語學習重要性的強調,則是為了轉變當時學子不願學“夷語”的陳腐觀念。吳汝綸己亥年(1899)二月十六日《與冀州紳士》信中為了勸誘河北年輕學子來跟英人學英語,甚至說:“西人語言文字,期以五年無不成者。五年之內,所耗束脩止一百餘金(以每月二金計算)。五年之外,即可大發財源,本小利大,莫過於此。”^⑦可即便如此利誘,他後來在《答馬通白》中也只能很無奈地說:“苦勸數月,得廿人。”^⑧其時一般士子不願學外語於此可見一斑。晚清一些士大夫甚至認為如果讓士子勤學外語,日後這些人很容易成為漢奸,因此對張之洞制定學堂章程要求中學堂以上必須學外語大呼不解:“今以勤習洋文,懸為功令,口耳習熟,心與俱化,洋人以利相餌,勢不至盡為漢奸不止。我朝列祖列宗,不責漢人以習清書,而文襄乃強多士以習洋文,此愚所未喻也。”^⑨

而第九、十兩段提及的外國興亡史事,恰是對第五段中“歷史學,知己往,世界變遷弱變強”^⑩的注解。給年輕學子傳授一些中國以外的史實,對於打破他們以中國為中心的井蛙之見顯然是有幫助的。

綜上可見,雖然不同於《勸學篇》對“中體西用”的系統化論述,貫穿整首《學堂歌》的仍是立足於正人心的訓誡和開風氣的啟蒙,其最終目的也是為了救亡圖存。

四、《學堂歌》的傳播

光緒八年(1882)五月,張之洞在給張幼樵的信中說:“一切筆墨皆須已出,不惟章疏,即公牘亦須費心改定,甚至自創。”^⑪中過探花、身居高位的張之洞之所以要費如此心力親自撰寫《學堂歌》這樣的通俗歌謠,最主要是因為考慮到其傳播接受對象是學堂裡的年輕學子。《勸學篇》寫完之後首先進呈御覽,然後頒行天下,張之洞主要是想藉此轉變統治階層中的有力者以及士人精英的觀念,即主為在上者說,嚴謹縝密的論述方能有說服力;而《學堂歌》寫完之後是分發給學子,他想要藉此影響中國社會未來的中堅力量,即主為初學者說,淺近的語言和活潑的形式顯然更容易被接受。而且,因為寫作姿態向下,《學堂歌》雖然頻頻使用第一人稱“我”意圖促成作者與傳唱者以及傳唱者彼此之間的認同感,例如說“我大清”、“我黃種”、“我同學”等,但居高臨下的訓誡與指斥以及苦口婆心的啟蒙與指引也所在多有。

《學堂歌》的撰寫,還跟張之洞考察外國學制時注意到外國學堂普遍有唱歌音樂有關,即《札學務處發學歌、軍歌》中云“近來外國學堂及行軍皆有唱歌一門,深與中國古風相合”。^⑫此前《學務綱要》也特別提到:“至於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秦漢以前,庠序之中,人無不習。今外國中小學堂、師範學堂,均設有唱歌音樂一門,並另設專門音樂學堂,深合古意。惟中國古樂雅音,失傳已久。此時學堂音樂一門,只可暫從緩設,俟將來設法考求,再行增補。”^⑬考慮到當時音樂教育人才的缺失,學堂暫不開設音樂課,其替代方案則是“誦讀有益德性風化之古詩歌”。^⑭可能張之洞覺得僅用古詩歌終究還是個缺憾,至少不便於新知的傳播與啟蒙,於是他乾脆親自操刀撰寫了新歌詞。雖然《學堂歌》沒有樂譜,但張之洞要求學生列隊上下學及操演時以此歌為行進節奏,“上六字緩讀,每一字一

步,此六字略一停頓;下七字急讀,七字共四步”。⁶⁹如果換成節拍,兩個三字句約略是一字一拍,須拉長聲調;七字句則是切分成三個雙字節和一個單字,大體是“二二一二”,共四個拍子,聲調相對急促。這與中國文人傳統的詩文吟誦很近似,即後文馮友蘭所謂“大聲念”、“把腔拉長一點”,頗便於傳唱者上口。

清末像張之洞這類懂學務的人之所以重視學堂裡的唱歌,是因為他們已經認識到歌曲能夠讓唱歌者在潛移默化中獲得德性上的熏習、情感上的陶冶以及知識觀念上的轉變。在《札學務處發學歌、軍歌》裡,張之洞說他親自撰寫《學堂歌》、《軍歌》的目的是讓學生、兵勇熟讀歌唱,“以期感發其忠愛之忱,鼓勵其自強之志”。⁷⁰比張之洞稍早些,1904年,保三也在《樂歌一斑》中稱:“唱歌為小學必修科之一。誠以唱歌者,引起兒童興趣,陶淑生徒情性,於教育上為至要之端也。……蓋學校之有唱歌,凡歷史、地理、修身、理科、體操等各科目,無不寓於其中。能使兒童口舌之間,引起各科之舊觀念,而得新知識,此一端也。”⁷¹身處新舊之交時代的張之洞已經意識到,歌謠是傳播知識、宣傳觀念的極佳工具,因此儘管他不懂音樂,却還是利用自己在文學上的特長,撰寫《學堂歌》,將他的知識和見解灌輸其中,以便更好地完成對廣大學子的訓誡與啟蒙。

在《札學務處發學歌、軍歌》中,張之洞除了要求學務處將發去的五千份《學堂歌》散發給省城學堂學生外,還另外要求“將《學堂歌》迅速放大字樣,工寫精刊,用好紙刷印一萬本,裝訂成冊,呈解來轅聽候酌發省外各學堂”。⁷²也就是說,湖北省城內外各學堂共分發了一萬五千份。

光緒三十一年二月初二(1905年3月7日)《申報》第十版載:“去年萬壽節張宮保自撰歌章多種,以《軍歌》及《學堂歌》最為得意,故日前特諭營、學兩處及警察局速刊五萬本,遍發軍人、學生及一切居民,以維人心而敦風俗。”⁷³這則消息刊發的時間距張之洞下發前述公牘兩個月差四天。據此,《學堂歌》以及公牘提到的“另行飭發刊刻”的《軍歌》後來實際刊印總數達到五萬份。而且,《學堂歌》後來似乎並不僅是分發給學生,可能也包括報紙提到的“居民”。如此一來,《學堂歌》的傳播實際越出了學堂。此外,馮友蘭晚年自述曾提到其時在湖北方言學堂任職的父親教他們唱《學堂歌》的情景:“《學堂歌》是張之洞作的,當時大、中、小學堂都唱……我們這些小孩也學唱這個歌,其實也無所謂唱,因為本來沒有譜子,只要大聲念,再把腔拉長一點,就算是唱了。”⁷⁴馮友蘭當時並沒有上小學,而是跟著母親在家裡讀書,他學唱《學堂歌》的經歷,足見《學堂歌》的傳唱絕不限於學校裡的學生。

不僅如此,《學堂歌》的傳播很快越出了湖北省界。光緒三十一年十二月初七(1906年1月1日)《申報》第三版有《奏請審定學堂唱歌科課本》的報道:

日前杭州將軍瑞留守奏稱:前在荊州副都統任內,以湖廣總督張之洞所撰《學堂歌》音節調適,詞旨顯豁,雖章句無多,而於中外政學源流,已能得其大概,且於當時邪詞誣說,辟之尤力,果能於童蒙時講明此義,將來自不為歧趨所惑,於學界不為無裨。因將原本照繕進呈,奏請飭下管學大臣審定後,頒為各省小學堂唱歌科課本,以宏教育。惟此歌本只為湖北學堂而設,其中六、七、八三段皆專指湖北事實而言,應否刪改之處,亦即由管學大臣參酌議訂。現已奉朱批:學部知道,欽此。⁷⁵

這份奏疏請求學部將《學堂歌》“頒為各省小學堂唱歌科課本”。此後,果然有了將《學堂歌》、《軍歌》以及張之洞撰寫的另一首《中國大地形勢歌》合在一起的《張相國新撰唱歌教科書》,甚至在進入民國後,還有以此為基礎稍加修訂、題有“張宮保鑒定”字樣的《繪圖蒙學唱歌教科書》。⁷⁶眾所周知,一旦成為課本,通常就意味著文本在大範圍內周期性地反復傳播,無論是傳播的廣度還是深度,

無疑都會大大增加。

另外,可以想見的是,《學堂歌》的歌謠性質意味著它的傳播有可能脫離對書面文字閱讀能力的依賴,因其音韻和諧而在口耳之間一傳十、十傳百。如果聽見進過學堂的人唱《學堂歌》,學堂之外的人尤其是那些年紀更小還沒有上學的孩子也可能跟著吟唱。

結 語

總之,就創作動機而言,張之洞創作《學堂歌》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想以歌謠的形式宣傳思想,但他採用的却是與中國歌謠傳統極具淵源的表達形式,真可謂“不失祖國文學之精粹”。因此這一創作本身就極具“中體西用”色彩。如果說《學堂歌》裡的内容折射了過渡時代新、舊知識與觀念之間如何角力的話,那麼它的傳播,則讓我們注意到,知識與觀念如何在體制權力的助推下滲入、深入到人們最初的學習以及生活裡,^⑦在近乎潤物細無聲的狀態下實施預定的訓誡與啟蒙。而《勸學篇》中的核心思想“中體西用”,也經由《學堂歌》淺近活潑的表達以及教育體制對此歌的有力推行,獲得了更為深入、廣泛、持久的傳播,擴大了它在中國的影響力。當然,今天的我們以歷史“後見之明”回望,不難發現,無論是《學堂歌》還是《勸學篇》的實際傳播效果其實都是啟蒙壓過了訓誡,推翻滿清帝制的辛亥革命最後在張之洞長期主政的武漢首先爆發並不是偶然的,而這一結果恐怕並不是心心念念要保全“我大清”政權的張之洞的初衷。歷史發展如此吊詭,足見大勢裹挾之下的前進方向根本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

①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提到甲午戰敗後,中國上下齊思扶危解困之道,“而其流行語,則有所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者,張之洞最樂道之,舉國以為至言”。王爾敏認為,梁啟超這段話賦予“中體西用”以時代觀念之地位,而後人却多因此誤以為張之洞首創此論。實際上,“張氏只為此類中之顯著人物,亦可視為中心人物。而‘中體西用’論之為晚清學人之共通觀念,已是不容置辯的事實”。參見王爾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論》,台北:華世出版社,1980年,第54頁。按,即便如此,張氏位高權重,登高一呼,影響力自然有別於普通學人。

②馮天瑜、何曉明:《張之洞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第397頁。

③康明安:《試論清末民初的學堂樂歌》,安徽安慶:《安慶師院社會科學學報》,1996年第2期;徐文武:《哪來的“洋腔”“洋調”:晚清滬上學堂樂歌的意義與魅力》,西安:《交響——西安音樂學院學報》,2019年第2期。

④⑤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

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苑書義等主編:《張之洞全集》第6冊,石家莊:

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258頁;第4258頁;第4258頁;第4262頁;第4262頁;第4262頁;第4265頁;第4265頁;第4259頁;第4262頁;第4263頁;第4259頁;第4258頁;第4261頁;第4261頁;第4264~4265頁;第4264頁;第4259頁;第4261頁;第4261頁;第4258頁;第4265頁;第4258頁;第4258頁。

⑥⑬⑰⑲舒新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料》,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第199頁;第420頁;第212頁;第204頁。

⑦苑書義等主編:《張之洞全集》第2冊,第1488頁。

⑪張之洞另有《札各屬免解賠款留辦學堂》公牘,見苑書義等主編:《張之洞全集》第6冊,第4247~4249頁。

⑫苑書義等主編:《張之洞全集》第6冊,第4263頁。按,可參看劉文祥:《晚清湖北地方教育現代化的困局——以湖北方言學堂停辦始末為中心的考察》,武漢:《近代史學刊》,第17輯。

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苑書義等主編:《張之洞全集》第12冊,第9705頁;第9708頁;第9717頁;第9744頁;第9738頁;第9704頁;第9767頁;第

9740 頁;第 9740 頁;第 9769 頁;第 9715 頁;第 9721 頁;第 10143 頁。

⑮《曾國藩全集》修訂版第 14 冊,長沙:岳麓書社,2011 年,第 379 頁。

⑯王先謙集解:《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8 年,第 455、456 頁。

⑰郭預衡主編:《中國古代文學史長編:先秦卷》,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 年,第 319 頁。

⑱郭茂倩編:《樂府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 年,第 792、1211、1213 頁。

⑲黃征、張涌泉校注:《敦煌變文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第 638 頁。

⑳謝思煒校注:《杜甫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第 38 頁。

㉑㉒謝思煒校注:《白居易詩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第 275 頁;第 396 頁。

㉓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8 年,第 120~121 頁。

㉔楊慎編著,張三異增定,張仲璜注:《廿一史彈詞注》,香港:中華書局,1938 年,第 5 頁。

㉕心鐵道人:《何必西廂》,上海:校經山房書局,1933 年,第 2 頁。

㉖盛志梅:《清代彈詞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08 年,第 35~37 頁。

㉗陳寅恪:《陳寅恪文集之一:寒柳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第 1、62、64 頁。

㉘邱心如:《筆生花》,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 年,第 1 頁。

㉙啟功:《創造性的新詩子弟書》,《啟功叢稿:論文卷》,北京:中華書局,1999 年,第 309、311 頁。

㉚㉛關德棟、周中明編:《子弟書叢鈔》,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1984 年,第 16 頁;第 716 頁。

㉜《新出大鼓書單刀赴會》,北京打磨廠東口致文堂刻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http://shanben.ioc.u-tokyo.ac.jp/index.html>)。

㉝《梁啟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年,第 5356 頁。

㉞汪康年:《汪穰卿遺著》卷一,《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787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703 頁。

㉟康有為:《康南海文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786 冊,第 743 頁。

㊱㊲吳汝綸:《桐城吳先生尺牘》卷二,《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743 冊,第 438 頁;第 446 頁。

㊳王榮商:《容膝軒文稿》卷二《〈學堂章程〉書後》,《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776 冊,第 788 頁。

㊴張靜蔚編:《中國近代音樂史料彙編:1840-1919》,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98 年,第 144 頁。

㊵㊶瀚堂近代報刊數據庫,<https://www.neohytung.com/>

㊷馮友蘭:《三松堂自序》,北京:三聯書店,2021 年,第 9 頁。

㊸吳小鷗、艾瓊:《張之洞與新式教科書的編撰——以〈張相國新撰唱歌教科書〉為例》,長沙:《湖南師範大學教育科學學報》,2009 年第 2 期。

㊹參看福柯:《關於監獄的對話》,收入杜小真編選:《福柯集》,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8 年,第 269 頁。

作者簡介:李鵬,中央財經大學文化與傳媒學院教授。北京 102206

[責任編輯 桑海]